

全国高校通识教育教材

招商政策 区域经济

刘 淼 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F400.40

全国高校通识教育教材

招商政策与区域经济

刘 森/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招商政策与区域经济 / 刘森编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7

全国高校通识教育教材

ISBN 978-7-5095-2193-9

I. ①招… II. ①刘… III. ①地区经济-投资环境-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明清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599 号

责任编辑: 李玲兰

责任校对: 王 英

封面设计: 陈 瑶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432 000 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ISBN 978-7-5095-2193-9/F·174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88190744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史研究回顾	(1)
第二节 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3)
第二章 明代经济格局与招商政策	(22)
第一节 明代边政与边饷供给结构	(22)
第二节 全面通商政策与盐粮交易	(33)
第三节 开中商茶与茶叶转运制度	(44)
第三章 大宗物资区域转运体制	(58)
第一节 漕运税粮的制度体系	(58)
第二节 漕粮海运制度及其演变	(67)
第三节 西部地区的茶课解运制及其利弊	(75)
第四章 传统生产体系及其转型	(88)
第一节 区域性民间性纺织业生产体系	(88)
第二节 江南区域性生产体系转型	(100)
第三节 生产体系转型的资本结构	(109)
第四节 传统产业的生产制度变迁：以茶户为中心	(119)
第五章 传统贸易体系及其转型	(135)
第一节 全面通商政策下的商人活动	(135)
第二节 商业组织与市场整合	(147)
第三节 商茶贸易与茶商	(154)

第六章 全面通商政策下的货币体系及其转型	(164)
第一节 地域性银钱比价变动：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164)
第二节 国际金融市场对地域经济的影响	(169)
第三节 晚清银行的创建与近代金融体系的形成	(175)
第七章 招商政策与区域价格比价关系	(179)
第一节 明代边方银米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179)
第二节 区域价格变动：明清棉布价格与商人贸易	(195)
第三节 茶马贸易价格及其比价关系	(201)
第八章 民间商人资本集团的形成及其影响	(212)
第一节 明代盐业商纲的形成及其意义	(212)
第二节 东南地区海商的海洋贸易	(223)
第三节 西部地区传统茶马贸易的社会影响	(231)
第九章 东西部区域经济关系及其演变	(246)
第一节 西部区际商路与区域市场开发	(246)
第二节 西南地区大宗商品交易与区域市场	(250)
第三节 东西部区域生产要素转移	(260)
第十章 结语：传统招商政策的意义与区域经济关系	(270)
参考文献	(275)

第一章

导论

自20世纪中期开始,历史学家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并已逐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这就使社会经济史学研究出现明显的特点:一是经济学家将传统的经济学、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理论同当代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的方法论相结合,运用综合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方法,力求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历史问题重新进行认识,提出较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在历史学研究大量借鉴新的研究工具的转型过程中,将试图解释社会经济历史过程的复杂关系以及运用数理分析工具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量的变动及其量的关系问题;二是历史学本身也开始重视将传统史学方法转向对区域乃至社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取得相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时间与空间差异大,形成历史性的区域社会经济差异也极为明显,如果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追求经济增长与现代化,这就必然地要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对现有的区域经济进行更为合理的历史与传统方面的阐述,以获得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历史经验与借鉴。换句话说,今天区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经济关系密切相关,注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史,以为今天建设之借鉴,是相当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史研究回顾

区域社会经济史所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其范围包括国家、区域、地方社会三个层面,而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社区(如村落、里社、宗族、街坊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研究,则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历史学家更擅长于对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结构与体制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并在对其形成、发展的原因与过程进行长时段观察的基础上,更容易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把握经济社会的运行实态和运行机制。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只有建立在长时段与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之上的研究,才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脉落及走向有所把握。

一、综合研究

区域经济研究是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许多学科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早在 20 世纪初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讨论中,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①。到 20 世纪后期,对于自宋代以来中国东南区域经济开发、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展等许多学术课题,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得的理论性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区域划分、区域规模、人口及城市化问题、区域差异、区域文化整合等研究方面。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中国晚清时期以前的区域发展的历史进行归纳,主要的观点是在此之前的中国城市发展是相当有限的,并没有出现城市的系统,而是在与地理环境相一致的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主流。

将中国区域划分成若干的地理与行政或经济的单元,从这些经济区域单元中提取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要素,如该区域内农业生产关系、水利的系统、灾害与救荒的社会系统、区域性早期经济开发模式、社会经济管理的系统、区域内的贸易与市场等问题。早期的历史学研究主要侧重在经济部门、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目前研究的热点则更加重视对社区“小地方”的深入研究。

在区域经济开发研究中,大体上是把新区开发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关系形成的突破口来给予学术关怀的。其结果,许多历史或经济研究的重点就转向社会经济关系初始形态研究上,同时对于这种早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育成长及其变迁,则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课题。

由于传统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停留在静态分析的层面上,对于区域变迁的学术考量是有困难的,而且很难说清楚区域内外人口变动、经济总量变动、收入变动引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真正原因。在对区域经济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思考下,开始注意区域内生产要素的组合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经济社会关系,同时对于单位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重点研究。对于区域关系与区域经济圈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近年对中国传统区域经济与市场整合问题的关注方面。将生产、贸易、移民、技术转移、国际资本流动,乃至国家间区域间的政府、企业、民间团体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关系作为国家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主题。而在区域社会经济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传统性的各种网络,包括人际关系、贸易关系、信息和管理的系统等。

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专业分工,区域的分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高,区域间的贸易活动越发展。世界经济形成后,各国在国际生产体系及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是由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角色决定的。(1) 生产的可能性,实际上讲的是生产者所

^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末以后,中国中央政权的力量如果同日益进化并持续增长的地域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的整合趋势相比,中央政权的社会统制就显得日益软化。此外,随着人口与资源的成长,官僚的规模与行政性的城市的数量就相应地缩小,因此在不可能增加大量的行政性经费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促进地方主义的成长,地方势力(乡绅、商人)与国家的互补关系就日益加深。关于此,参见费正清、欧文·O·赖肖尔与阿尔伯特·M·科雷格合编《东亚:转变与改造》,休顿·米芬公司,乔治·阿伦与安温,1973 年出版;何炳棣:《成功的阶梯:帝制中国社会流动面面观,1368—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第 2 版;王业健:《帝制时代的中国地税,1750—1911 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施坚雅:《帝制晚期的中国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提供的产品与劳务究竟有多大的市场即市场容量问题；(2) 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在不同的区域收入水平的不同，带来生产体系组合的变化；(3) 生产体系的产业结构决定社会生活方式；(4) 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区域整合具有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的可能性；(5) 由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随着生产体系、贸易体系的变化，必然出现二个发展方向：或区域的界限越来越明显，或专业化程度提高，竞争加剧。

近年来，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去研究较多的是国家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即对于传统社会国家经济的运行，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在朝代更替的初期，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较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权力逐渐减弱，而是由地方社会起主导作用。而在对地方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很多研究证明除新政权初始阶段的地方行政或准行政权力外，对地方的控制与支配，主要是由地方社会来进行的，这即是地方的精英及其群体所发挥的作用。精英控制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功名的人的作用上，而到后期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导致地方政治权力也开始由功名人向商人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方面转化。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因为大多数的研究是集中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方面，而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就成为当今历史学界所关心的研究课题之一。

关于“区域”的概念，简要地说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其他地方社会经济的各种要素和经济量与该城市形成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区域^①。如果具体到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历史差异性，显然需要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应该承认，区域社会经济的形成，显然是以一定的空间即区域的区划，如行政区域、地理区域（以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范围所确定的区域）、经济区域^②、文化区域（以方言群、种族、民族为基本标志的特定文化人群）。而对于区域经济来说，主要是指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具有同质性的区域经济体。不同的区域区划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区域区划具有一定的时段性。如果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层面来考虑，区域的概念显然是要同某一时期在特定的地理、行政、经济与文化复合的地域内进行研究，否则对于如此复杂的区域社会经济形成与发展等问题，很难说清楚。

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历史学家注重从空间位置、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及时间延续的长时段来观察，以确定某一历史时期的区域经济结构的特质；经济学家则关心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个变量及总变量所形成的关系。无论怎样研究，都需要实证研究来证明。如经济结构研究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运销结构、价格体系、金融与资本体系、技术与劳务供需体系、城市化程度、城乡经济关系、市场组织等问题，显然都需要进行说明，两者之间并无大的区别。前学者主要研究范围：(1) 以城市（市镇）为中心，如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则是河口地区的例证。(2) 以地理环境，即河流、边界或交通线为中心，如运河流域、长江流域、沿海地带的研究，如山东临清研究、苏杭运河研究等。

① 参见（美）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② 所谓“经济区域”，一般是指以生产或销售的市场圈为范围的区域，如以淮河为界的米麦种植区域以及历代所实行的“行盐疆界”问题等。尽管在该经济区域中包含有一定的行政的、军事的、政治的或地理的区域，但在生产与销售、消费的联系上，则具有国家制度强制的经济区域特征。这一点，在“行盐疆界”的划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此，参见拙著《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二、专题研究

以产业或行业为中心,如农业、手工业、商业乃至盐业、纺织业的研究,其中除本行业的经济结构外,更重要的是把产业行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一个系统,重点解决行业经济究竟怎样运行的机制问题。如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发展,已成为具有区域经济体的意义。对江南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自然为学界所瞩目,迄今已有相当多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问世^①;而研究者论集和研究资料辑集出版,也为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提供了方便。^②

回顾前学者的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关于以区域差异为主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区域性的产业研究方面,其中对农业、商业、盐业等国家所控制的产业研究。在早期研究中,日本学者桑原鹭藏于1925年所著的《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1940年冈崎文夫、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1964年宫崎市定《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③,其中所论述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了人口南向迁移的过程及其内地移民区交通、农业、产业基本技术的变化、资源即劳动、资本利用集约化倾向、社会的商业化、社会精英迁移与社会文化浸透,使从华北、华中、华南、从内陆向沿海具有生态利用空间的地方进行重点移动等区域社会经济问题。

在产业研究领域,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开发、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研究,则是区域经济史的重要课题。1962年,日本农业经济史学家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力作的问世以及197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区域的展开》^④,则成为研究自中国春秋战国以来各历史时期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区域农业历史发展的力作。该著以农具、作物品种、施肥、土地利用、土地制度、农业商品化为研究目标,进而对农业资源利用的集约化过程进行考察,这就为研究农业区域差异开创了新的领域。美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何炳棣则是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华北黄土平原的农业、唐末至宋代的江南水稻灌溉农业、明末清初引进的新大陆作物与中西部山区开发、技术变化与资源利用的区域性转移为其着眼点,同时在人口史方面对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作详尽考察,这就说明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将土地、人口、产业的相关

① 洪焕椿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罗奇主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丁日初之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茅家琦主编:《长江下游城市和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和《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翔:《苏州丝织业“账房”发展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敏、朱英:《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② 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桑原鹭藏:《历史上的南北中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岩波书店1925年版;加藤繁:《中国学杂草》,生活社1944年版;宫崎市定:《亚洲史研究》第四,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版。

④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御茶水书房1962年版、1979年增补版。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的区域展开》,龙溪书舍1979年版。

动态作历时性、共时性研究。尤其是在农业产业研究中,江南高产农业的实现,应该说在区域农业产业发展史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历史地位。而高产农业的收益是与高额重赋即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相联系的,其农业发达的基础,则与江南发达的水利有直接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水利在农业灌溉、运输、人口的积聚方面发挥重大效益。江南的水利开发研究,尤为学术界所关注。洪焕椿总结出明代苏松治水的经验的研究^①,彭雨新认为在苏松地区重大水利修治由国帑开支经费,地方农田水利支出,由各州县自行设计解决,工程实施则按照受益比例分摊,将治水与赈灾相结合,通常采用“业食佃力”的办法^②。潘清认为明代太湖治水分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其管理组织方式、经费来源及结果都呈现不同的特点^③。蒋兆成《明清杭嘉湖农田水利设施》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明清杭嘉湖地区水利设施。专门总结江南水利技术工程的有郑肇经、汪家伦、张芳等人的研究成果^④。而吴滔将明清江南地区抗旱御涝的水利组织联系起来,进而对明清时期的水域面积、人田比例、农田经营方式以及治水方法的差异作比较研究,为区域农业经济与水利关系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成果^⑤。在国家对于农业的控制与支配方面,尤其对农业家庭的农户的控制,则是近年有关专家关于土地关系与赋役制度研究的重点^⑥。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水利与社会人口、移民等问题进行考察,则是以社会人类学家冀朝鼎早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的著作为标志的^⑦。该著作对各王朝各区域水利投资是从黄土高原、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以水利资源的利用为媒介而逐渐扩大,水利及水运所提供的经济的、政治的整合力,说明区域的历史推移过程,则是以经济地理为核心的。章生道对于河流状态的关注点,与其不同的是从纯粹的地理学观念出发来研究居住史、都市化过程,对古代中国人的内地移民与定居样本进行分析,其显著的特点是揭示了定居的低地志向性、中国人的由来、低地民、水边居民及国家河流居民等许多重要的问题^⑧。水利社会学所说明的是,中国人定居的历史,在大移民的时候是通过四通八达的河流实现的。河流不仅提供了交通的便利,还有自然冲积的功能,即在其分水口、河口地方因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壤资源,为稠密的人口定居提供了前提条件。长期的定居生活形成都市化,水利则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如在1890年时,福建58个县中有53个县是在海拔400米以下的低地(从总体上说,中国中南部全部是海拔400米以下的低地),有近50个县是靠近河边的。而在1890年时18个省的1276个县的县治,有913个县(约占72%)分布在400

① 洪焕椿:“明代治理苏松农田水利的基本经验”,《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② 彭雨新:“略论清代苏松地区农田水利经费的筹集”,“太湖水利史论文集”,《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江汉论坛》1984年第6期。

③ 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的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④ 郑肇经等:“江浙潮灾与海塘结构技术演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袁明全:“明代太湖水政初探”,《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⑤ 吴滔:“明清江南地区的乡圩”,《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⑥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版;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⑦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初版于上海(1930年),派拉贡图书重印公司(纽约)1963年再版。

⑧ 章生道:《中国县城都市地理的若干方面》,刊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第52卷,1961年版;《中国城市化的趋向》,《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第53卷,1963年版。

米以下的低地。县城的名称大部分是具有居于水边的意思,这表明城市居民的低地意向是自古以来形成的。罗友枝教授关于明清时代福建、湖南、江苏的区域研究,认为区域开发研究需要对交通问题给予更多地关心,这显然是很重要的观点。

在区域人口史及移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加藤繁很早就对全国、各路、各府州县的三个层面的统计数据进行过处理,并以此进行计量性的动态推论。而青山定雄的《隋唐宋三代户数与区域的考察》(1936)^①,则是以606、742、1080年各个统计年度所作的全国户数统计数据为基础,继而对5个世纪中的人口在时间上、地理上移动的方向性进行推论,由此对全国、区域、地方三个层面的人口变动的时间系列及空间分布所作的动向偏差及其相关性进行解释。他认为随着“开发前沿”的推移,人口规模增加,其全国性标记与相关的宏观经济动向的整合是一致的。近年来,约翰·杜兰德、罗伯特·特威尔、贾永吉、刘翠溶运用人口学的方法,推断11世纪时中国已增殖1亿~1.2亿的人口规模^②。如果按照当时全国的人口数及其成长率计算的话,那么,清代人口约按0.7%~0.8%的速度增长,而明代约为0.4%~0.5%的增长幅度^③。这样的估算实际上已达到近代前的规模,但反过来说,如果以区域作为视点的话,人口增长与人口流动区域社会必然形成地域性的人地压力加大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川胜守、森正夫对于江南的税制、土地所有、水利所作的细致研究^④,滨岛敦俊围绕与水利田生产要素相关联的时间序列的推移,即“田头制”即“业食佃力”向“照田派役”(分圩结甲)体系的转化,以及中国学者李伯重指出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农业劳动集约化的发展以及16世纪开始资本投入比重增加等问题,都表明区域经济差异

① 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卷下,东洋文库,1953年,第317—403页。青山定雄:《隋唐宋三代的户数与区域的考察》,历史学研究6—4、5,1936年。杜熙德:《唐代的财政》,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约翰·杜兰德:“中国的人口统计:公元2—1953年”,刊于《人口研究》第13卷第3部分,1960年。R·哈特威尔:“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化:750—1550年”,刊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42卷第23期,1982年;贾永吉与魏不信:“中国的人口与制度:对帝制时期的统计的分析,公元2—1750年”,刊于《人口史年鉴》,1971年;贾永吉:“中国自古代到十六世纪的农业开发与‘过密化’模式”,明代(1368—1644年)中国人口的新情况,《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1978年第2期;“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长与保甲制度”,《人口史年鉴》1979年;刘翠溶:“长江下游地区一些家族的人口动力:大约1400—1900年”,《中央研究院经济论文集》第9卷第1期,1981年;“中国的家谱:历史人口研究的一个资源”,《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8年;“明清人口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合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集》,1983年。何炳棣:“宋代中国人口之估计”,收于《纪念巴拉斯宋代研究论文集》第一集,牟顿公司1970年出版。周元和(音)“清代中国人口研究”,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李中清:“中国西南地区移民运动的遗产”,刊于《人口史年鉴》1982年;李中清:“中国西南地区的食物供给与人口成长”,刊于《亚洲学刊》第41卷第4期(1982年);李中清与伍若贤:“十八世纪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与家庭:辽宁道义屯研究的初步结果,1774—1798年”(译者按:原中文译作774—1798年,兹据李氏与伍氏著作改正),刊于《清史问题》第5卷第1期(1984年);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刊于《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刘广京、黄国枢:“140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收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出版情况见前),台北,1979年出版。特别是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又,德怀特·柏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附录A《中国人口资料》,第192—216页,附录B第217—240页。王业健:《帝制时代的中国地税:1750—191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84—92页;R·哈特威尔:《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化:750—1550》。

③ 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估算,明代人口增长率当在0.2%~0.4%。关于此,参见其力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汲古书院印刷,1988年版。

④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参见本书第127页注(70)。

在持续扩大。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关系的立论基础,是以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所构成。除农业的产业研究之外,对手工业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研究的日益开拓,是从加藤繁教授开始的,藤井宏、西嶋定生、佐藤武敏、佐伯富、周藤吉之、青山定雄、星斌夫、波多野善大^①,以及中国学者傅衣凌、严中平、彭泽益、吴承明对于中国产业史的研究^②。不仅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决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其理论的意义还表明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与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区域经济体已具有外向拓展与联系的能力,尤其是在15世纪中国作为东方经济体逐步进入世界市场的背景下,其中国区域经济自然而然地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随之“整合”、“变迁”。

问题是,作为中国区域经济体连接点,商人商业组织在区域市场整合过程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问题,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对商业组织活动最为活跃的江南地区而言,研究者的认识也发生大的变化。早在70年代以前,海内外学者几乎将中国的会馆公所视为如同西方中世纪那样的行会,不少学者还以为会馆公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苏州等地会馆公所碑刻资料的结集出版,江南商业组织问题研究遂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洪焕椿在:“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一文中提出,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既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那种把会馆公所不加区别地一概看作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行会组织,而看不到它在商品竞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想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③。吕作燮则进一步就会馆公所的类型、性质、功能进行划分,指出会馆是同乡组织,其职能是多用途的;公所是同行组织,职能是商业性的,两者有所区别,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④而汪士信坚持认为,商人会馆就是一种商人行会,而且是中国式的商人行会,商人会馆是商人行会的初级阶段,继续发展其同业关系的性格就表现出来^⑤。彭泽益则认为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这一命题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⑥。进入90年代,会馆公所研究又有所突破,王日根在其所著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则将会馆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类型之一,并对会馆的

①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第36卷第1、2、3、41期,1953—1954年,其中译本参见《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佐藤武敏:《中国古代工业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2年版;《中国古代组织物史研究》上、下,风间书房1977年、1978年出版。佐伯富:《中国盐政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7年出版。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出版。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3年版;《明清时代交通史研究》,含川出版社1971年版。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1年版。

②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彭泽益:“近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 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④ 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又,“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⑤ 汪士信:“明清商人会馆”,《平准》第3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⑥ 彭泽益:“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运作、文化内涵与社会整合作用问题作了较全面的研究^①。此外,不少学者在会馆研究的基础上,则对商会的出现与作用问题给予关注,并将清末兴起的商会与前期的会馆公所的结构、职能、性质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形成新的见解^②。如马敏、朱英认为会馆公所属于封闭性、停滞型的社会组织,而商会则属于开放性、发展型的工商组织,两者的基本职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落后封建性与近代民主性也形成鲜明对照。至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数量问题,吕作燮则考证出清代南京共有会馆 37 个,而唐文权考证出苏州共有 157 个公所^③。如果说区域差异的连接点,实际上商人的异地商业交易所固定下来的标志即是会馆公所(同乡的设施)的成立问题。其分布的情况,仅以何炳棣对很有限的方志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清末北京就有 400 多所会馆公所(其中华北 7 省 99 所,华中、华南 8 省 214 所,西南 4 省有 24 所),其他省都、府州及县镇的粗略统计有 700 余所^④。在这里,如果仅以 1227 年、1560 年、1730 年、1900 年作为时间序列来测定其分布密度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明从明末至清代的江南市镇是以特产品的分化即一方面是集市的次数和时间的缩短,并逐渐向商铺的方向迈进的。

在 13~19 世纪,因其时代不同,其异地交易的规模及集约化水准不用说是明显扩大了。而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在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要素也随之得以扩张。技术要素^⑤、资本要素^⑥、区域性与地方性的资源、国内贸易同海外贸易的连接环节等方面,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商业性及商业规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已达到历史最高峰。

流通中的商品规模与质量问题,则因空间的广阔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宋代,形成以都城开封、杭州为中心的经济圈,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杭州、苏州等江南人口稠密地区与福建、徽州等较偏僻的地区,不用说奢侈品,就是交易量大而且价格低廉的粮食、木材、矿产品等农产品和原材料,则必然存在异地交易的关系。沿及 16 世纪,棉花、棉布及以粮食为中心的异地交易,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⑦。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及手工业生产则在宋代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明清时代内陆与边境地区的粮食供给已经正常化的情况下,商业、手工业日常交换的普及,带动了小额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及市镇的兴起。而货币租税政策在全国区域内实行,显然是 16 世纪以后的事。明代海禁解除之际,日本、新大陆的白银,加上日本、云南所产的铜,使清初一个世纪的铜材供给有了保障,这即是清朝建立银、铜的货币制度并使之有相当大的货币储备的基础,这是十分清楚的事实。如果参照近年

①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②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徐鼎新等:《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马敏等:《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明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 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八,《南京史志》1984 年第 5 期;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④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 37~99 页。

⑤ 关于“商业技术要素”一般是指交通、商业金融、基础产业技术与交易方式与商业经营方式。

⑥ 所谓“市场要素”,是指商业大都会的运输与交易组织、金融组织的发达程度、异地商业都市与县、镇、市的地方市场连接环节、市场交易与生产者的关系与交易关系等。

⑦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882~899 页;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一),第 12~35 页。

来有了长足进步的清代物价史研究成果^①，其银价、钱价、粮价及谷米税率的变动是有直接关系的。此外，对土地、人口比率的测定，也是随区域、地方经济整合度的疏密而显现出空间偏差的。关于货币供给的普及与市场要素扩大之间关系，则表现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增长。

日本学者藤井宏、西嶋定生教授关于明代多种纤维制品的区域性交易、区域专业分工及专业化、流通、东南诸省手工业品与内陆诸省的农产品交换所形成的对流诸问题的研究中，已经揭示出存在先进、中进、后进区域模型的问题，并且认为不同的区域都是各自变化其商品流通的。如在长江下游地区，宋代以来的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经常陷入米谷过剩的情况，加上商业及手工业的比重相对较高，所以形成将谷物向湖广、江西、四川大量输出。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原棉、棉布交易市场，一方面是原棉的一部分向华南输出；而另一方面则是向北方诸省大量地购买原棉。长江下游地区所产各种规格的棉布与发达的绢布、生丝则向华北并全国市场销售。至清代，河南、湖广的棉布产品，其生产规模及品质都得以改良，其产品不仅在长江下游地区销售，而且已占据陕西、山西、云南、贵州的市场。而湖广米也向江南、岭南市场输出。在福建，苏州、杭州、潞州的绢织物、景德镇所产瓷器也大量向外地及海外贩运。

与商业专业化所并行发展的是产品的多样化。例如棉布的生产，即有中机、标布、三梭布及仿制品等，这就更进一步开拓了市场。同一商品的生产所围绕的广阔的市场，就形成不同档次的产业，并形成竞争的局面。即便是在宋代，福建所产的陶瓷，已出现仿造越窑的产品。而绢织物中，有绍兴产的樗蒲绫，同吴兴、遂宁（四川）的产品竞争，与苏州的产品进行技术及主产地方面的竞争，比遂宁产的绍兴尼罗更强些的是越罗及明州所产的婺罗^②。而在制纸方面，四川生产的假苏签、假山南、假荣、似池纸，其在四川和绍兴还有澄心堂纸（歙州、池州所产上等纸）。而在水稻品种方面，其来源地名多存在混用的情况^③。这说明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不只是证明其转移范围的扩大，而且在特定的后发区域内，仍然存在同样的技术相互竞争主产地地位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形成产业专业化与区域间层次差异的背景，显然是与内陆地域的移民在时代上、空间上的偏差以及随之产生的技术转移、商业贸易的兴起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地方序列与时代序列方面，伴随着资源开发与市场要素的改善，经济集约化的程度及其移动的步调则是大不一样的。此外，发生在某一地方上的变化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变化，其事情的起因及其结果是否相同等问题，至今并未见有人给予明确的说明。对于技术要素的重视，很高的生产性与富足的生活所产生剩余这一决定性因素，先进与后进区域的概念形成以及先进、中进、后进区域的区分，则在于谷物的剩余、自给与非自给的三分法。根据这一划分，其结果必然是

① 全汉升与里查德·克劳斯：《清代中国的稻米市场与贸易：物价史论之一》，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此外，全汉升教授的《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二册，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中、下册，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其中收录唐宋元明清的物价史研究；同李龙华合著《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3年。王业健：“清代物价的长期趋势”，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学报》第5卷第2期，1973年，《帝制时代的中国地税，1750—1911年》。李中清：《中国西南地区的国家与经济，1250—1850》，将刊稿。岸本美绪：“清代前期江南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卷第9期，1978年；“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动向”，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4期，1979年；“关于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9卷，1982年。

②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271—293页。

③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241—269页。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第175—199页。

归结为层次的差异在时空方面呈直线发展的滞后问题。在这里,如果参见关于以1368~1953年整个时期为研究对象,即以统计精度很高的年份(1393年、1820年、1953年等)关于人口、耕地统计所反映的制度性质的史料以及对照何炳棣教授所作的复元式的研究,对宋以后一千年间的全国人口增长动态及其与技术要素、内陆移民三者的关系,应有大体上的了解^①。而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则为认识中国人口体系的特点及中国人口过程的集体性提供了帮助^②。

首先是农业技术的改良。在11世纪,以占城稻为中心的耐旱早稻品种的引入,比西欧“农业革命”早数个世纪。集约性的灌溉水稻种植技术,具有相当高的养活人口的能力以及促使耕地面积日益扩大的作用,使过去有较多空地的东南地区成为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人口增长的步伐,至元代得以加快。而至明代初期,由于生产基础的恢复,南京、北京周边地区的移民得以更快增长。至明代中后期,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可以推断人口规模与耕地的供给仍处于增长趋势。而在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北部、安徽南部及福建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于是手工业与商业的比重由之加大。就总体而言,其人口增长的理由,正像何炳棣教授指出的那样,则是由于灌溉水稻农业的更进一步的普及,使内地有荒地的地区如湖南、湖北、淮河流域、华北的一部分及岭南、云南地区,都成为吸纳移民的地区。

灌溉水稻农业技术的扩大与人口的增长,至1830年已达到饱和点。17~18世纪,引进的新大陆农作物已开始向汉水流域、四川、陕西、广西、云南的山区拓展。于是在很短时期造成土壤流失,从而使收获递减。但在人口饱和的情况下,新作物引进则促使耕地面积的扩大暂缓了人口压力。如果同西欧社会因不可克服的缺粮问题而出现产业革命,即最终还是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相比的话,那么,中国农业革命的经验则是将人口与技术始终限定在对荒地的开垦上,这一过程长达数个世纪后才出现经济滞后,终于导致17~18世纪爆发人口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耕地扩大与技术引进的结果,反倒引发更严重的粮食不足与人口过剩现象。

区域关系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区域市场关系的形成问题。由于地缘关系的发展同市场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市场关系受到地缘关系的压抑。明清江南由于商品生产的发达、特殊的经济结构的需要和对外交流的便利,无论区域内部,还是与其他区域之间以及对国外的商品流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流通商品内容较之以前也有了本质的不同。关于江南区域的商品输出与周边及其他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成为探讨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③尤其是在粮食、布匹、铁器与木材及其他地方土特大宗产品的交易方面,对于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地方经济变迁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令人感兴趣的是,江南区域各种商品的输出如江南丝绸销往西北及海外市场的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④由于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严重的缺粮区,商品交易量大,对区域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当不可忽视。因此,考察商品

^①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刊于《经济史评论》第9期,1956年、1957年。

^②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③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萧国亮:“鸦片战争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联系的加强”,《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④ 关于此,参见前示林永匡、魏能涛、林仁川关于江南丝绸与日本商品贸易的研究等。

交易量就成为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但在估算方面,恐难以一致。如吴承明估计清前期江浙每年输入安徽、江南和四川的大米约为1500万石,输入奉天的豆麦达到1000万石^①,与其他学者的估算有所不同。

江南是全国最大的丝、棉生产基地,其生产量和商品量长期为人所瞩目。对于江南棉花输出,徐新吾认为,明中叶以后北方棉花销向江南,主要并不是供江南纺织业使用的,而是南下转销到湖广及其他地区;江南本身棉产有余,并不需要购买北方的棉花^②。吴承明也认为,明代松江织户所需棉花可以自足,并有余花供毗邻的浙江嘉兴嘉善一带织户,由北方南运的棉花,主要是供应滨海各县。李伯重则认为,江南的棉花输入,明代似乎比清代更多,棉花输出,则清似盛于明。对于棉布的商品量,徐新吾认为每年有2000多万匹。吴承明估算苏松地区年产布约4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有4000万匹。萧国亮推算松江府土布年产量约在3075万~3192万匹之间,年商品量约为2702万~2820万匹。关于江南丝绸的产品量,吴承明估计明代苏杭丝织品商品量每年可达30万匹,价值为银30万两左右。范金明估计明代江南丝绸价值量约为银38万两,清代为1500万两。

关于区域商品市场与市场组织研究,一般认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其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并得到了逐步发展。^③如陈忠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江南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具体可分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以及城市中心市场三个等级;唐文起的“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农村市场简论”既从等级角度考察了县城、集镇、定期集市和庙会各类市场,又从商品角度考察了粮食、纺织品、土特产品等市场。刘秀生认为,江南棉布市场从清代中期开始衰落,其原因不在于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棉布的内部生产和交换,江南棉布的销售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销售市场的大小只能取决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棉布生产量。^④

与商业活动相关的是关于运输业的市场整合问题。萧国亮在“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一文中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运输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⑤作者认为:商业资本向航运资本的转移是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形态;上海沙船业中出现了专门经营沿海运输的原始资本家;上海沙船业的经营方式是航运资本的运动形式;沙船业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性质。关于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也有专门论述,并且对船工工资、商业利润等作了定量分析。

关于地方商人与商业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由我国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李伯重估计江南年输入长江中游米1000万石,东北、华北大豆饼在1000万石以上。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又,“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萧国亮:“关于清前期松江府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范金明:《江南丝绸史研究》、《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③ 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唐文起:“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农村市场简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刘秀生:“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⑤ 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收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等初肇其端,他依据地方志与文集资料,探讨明代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与经营行业^①。吕作燮利用家谱资料进一步探讨了明清时期洞庭商人的形成过程、活动地域、经营内容和近代上海地区洞庭商人的经营情形。范金明则以苏州地区的商人进行系统研究,对于地域性商人群体的经营活动与市场关系有进一步了解^②。除苏州地区而外,学界则集中对徽州商人在江南乃至其他区域市场活动进行研究,^③关于上海宁波商人,则是讨论近代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经济的重要一环。^④曹峻的“近代上海宁波帮的经济和组织”等,就是考察近代宁波商人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进行商业活动的。而在对中国东南部地区商人与商业活动的研究中,考察闽粤商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与社会活动,如陈忠平“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等^⑤。但问题在于,各地商帮在江南活动的全貌还未充分揭示,各商帮之间展开竞争的方式并不清楚、商帮的慈善设施也较少触及,所有这些,显示出外地商帮与江南经济社会的关系还有待深入探讨。此外,以地域关系为主体的地方商人集团的出现,并活跃在中国国内贸易及海外贸易活动中,是否具有如同国家所编定的如漕运、盐运商帮组织,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说,将同一地域但经营并无一体化关系的商人视为商帮的说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区域形成是以不同的社会人群分布为基础的,而人群是有组织的,是由不同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人群所形成的,所以在以地缘社会为基础的区域內,不同关系的人群,其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农耕社会中,由于固有的土地与人口的关系,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移民尤其是商业移民、技术移民的大量流入,最终改善了外籍民与土著民的比例关系。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区域社会人口结构;另一方面成为新区开发的主体,生产要素得以重新组合。

明清江南“田少人稠”,人地压力大,矛盾突出,人口增长控制与人口流动成为影响江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从翰香考察了明代浙江、江西和南直隶的人口密度,认为江南地区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不断膨胀,非但不能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已经成为该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⑥李济资通过考察苏松常三府的人口消长状况^⑦,发现户籍统计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很多地方人口不增反少,其原因并不是人户离开了江南,而只是人户为逃避繁重的赋役躲过了户籍登记而转移到了他处,可见户籍人口的消长,与田赋轻重有着直接的关

① 傅衣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社会科学》1948年4卷2期,后收入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② 范金明:“洞庭商帮”,见《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钻天洞庭特点的探讨”,《货殖》第1辑;“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③ 张海鹏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仁安:“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徽州商人”,《上海研究论丛》第6辑;陈学文:“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浙江”,《徽学》第2辑;《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王廷元:“徽商与上海”,《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8年第5期等。

④ 曹峻:“近代上海宁波帮的经济和组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等。

⑤ 陈忠平:“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

⑥ 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⑦ 李济资:“明代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